

序言：在香港看亞洲

羅貴祥

「亞細亞」、「亞洲」、「東方」這些名稱與概念，是秉承希臘文明的羅馬帝國所發明的，主要用來分別歐洲自己與他方的世界，創造自我與他者的身份標籤。¹古代在這些「他方世界」生活的人種，究竟叫不叫自己做「亞細亞」或「東方」，需要深入的考證。然而，進入了歐洲霸權主導的帝國殖民主義年代，所有被歐洲歸類為「他方世界」的人種，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亞洲人」、「非洲人」、「(南)美洲人」、「澳洲人」等——面臨這種被歐洲劃分類別的無可選擇的處境。雖然在被逼接受這種分類，但現代亞洲人怎樣理解及使用「亞洲」這個概念，卻可以有許多可能性以及歷史的複雜性。

不能逆轉的歷史事實是，進入現代世紀，歐洲的認知方法伴隨著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支配了全世界。在對抗的層面上，「亞洲人」似乎很大程度上承認了自己舊有的模式已失效，但又未能創造新的一套與歐洲(或籠統地稱為西方)的力量抗衡。唯一的選擇，就是矛盾地使用西方的一套，來為自己定義或再定義，以此檢視自己、認

識與建立自我，希望從而找出新的可能。這種以西方價值標準，幻想能造就新自我的作法，當然是充滿矛盾的困局。從十九世紀至今，「亞洲人」跌跌撞撞、屢敗屢試地要以他人的尺度，企圖畫出自己的空間。

最熱中「亞洲」這個概念的，無疑是能最先成功現代化國家化的日本。明治維新的日本需要「亞洲想像」，因為「亞洲」既可以聯合區內力量對抗西方，也可以挑戰中國在區內的歷史中心地位，有助日本成為新的領袖。早期日本的「亞洲想像」，有「脫亞」與「興亞」的對壘，但又有相互重疊的地方，底線離不開強調日本的國家主權、利益與國際地位。興亞論者提出，亞洲諸民族的聯合，特別是日本與中國互相提攜、同文同種，黃種人對抗白種人，把「東方」理想化為精神文明的代表，抗衡「西方」的物質文明和暴力侵略。但亞洲主義後來變質為替日本軍國主義張目的意識形態，所謂泛亞身份、黃色人種、「八紘一宇」（即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大東亞共榮圈，都不過是帝國主義侵佔他國與殖民統治的幌子。吊詭地，「亞洲」是歐洲殖民主義者用作區分他/我的標記，但日本的殖民主義者卻用「亞洲」來融合被侵略統治的人，並以此為擴張的策略。²既有浪漫一面，也有擴張野心一面的「亞洲想像」，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曖昧地存在著。

中國的亞洲意識，無疑受到日本早期的「亞洲想像」影響，但真正令中國精英接受自己是亞洲的一份子，拋下大中原天朝心態的，其實是來自歐洲列強的巨大衝擊。儘管傳統中國對來自北方（即中亞）的民族歷來都有提防抗禦，甚至也曾被這些民族擊潰及統治，然而似乎都不及歐洲列強帶來的改變那樣重大。中國知識精英對亞洲近鄰的關注，主因是受西方列強所逼使。自清中葉始，中國周邊與區內朝貢國都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覬覦，加強邊防與增進對這些區域的認

識成了清廷首要任務。從「西域」到「東海」，從越南到朝鮮，清政府因海防而關注「南洋」以及該地的華僑力量。英國透過緬甸窺伺雲南，藉著印度向西藏延伸；俄國對中國北方歷來有領土野心；法國從越南滲透入中國南疆；中亞回民阿古柏 (Yakub Beg) 在英俄的助力下在中國西北建立了回族王國；日本先後吞併朝鮮、琉球、臺灣，再進佔中國的東北與內蒙——這些近代事故，不斷令中國的知識精英加強亞洲意識，驅逼他們接受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亞細亞的一部份，中國的命運像它的亞洲鄰邦般，正在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以至侵佔。

同仇敵愾，中國知識精英因此對亞洲多了歸屬感。王韜 (1828–1897)、康有為 (1858–1927)、孫中山 (1866–1925)、章太炎 (1868–1936)、梁啟超 (1873–1929)、楊度 (1875–1931)、劉師培 (1884–1919)、李大釗 (1888–1927) 等有名的知識分子，都發表過有關中國與亞洲關係的言論。即使他們談王道，反霸道，強調亞洲諸國諸族平等，整合亞洲弱小民族，從帝國主義列強的壓逼下解放亞洲、解放世界，但始終未完全脫離中央大國優越文明的天下觀心態，亦未能建立一套獨特的亞洲觀念，他們的想法往往只是為了回應或反駁日本帝國的亞洲主義而提出來。

國共鬥爭時代，雙方都有不同的「亞洲想像」。國民政府的亞洲主義，雖然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抗衡日本以亞洲為名的全面侵略，但也有因應中國內在環境的元素在內。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建立亞洲概念等同關注中國的周邊形勢。帝國主義列強蠶食侵佔中國的邊疆，刺激起二十世紀初中國人的疆域觀念。即使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認同那些邊疆地區是固有的中國領土，但社會一致的共識是，假如邊疆落入列強手中，將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掀起了研究邊

疆的熱潮。各種報刊雜誌、學術團體相繼成立，積極推展研究邊疆、開發邊疆、保衛邊疆的行動。以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與三民主義思想為主導，國民黨要員戴季陶與他的新亞細亞學會組織邊疆考察團，開辦亞洲語文班，並出版邊疆研究叢書等具戰略性的行動。從1930到1937年，新亞細亞學會發行的《新亞細亞月刊》，專攻中國的邊疆（特別是西北）、少數民族及其他亞洲地區的研究，藉以拯救及振興國家。³《新亞細亞月刊》的創刊宣言名言：「亞細亞是五大洲中最大的一洲，中國是亞細亞民族中最大的一個民族，中國的衰頹是亞細亞一切民族衰頹的原因，中國的倒楣和失敗是亞細亞一切民族倒楣失敗的原因。所以，中國問題是亞細亞一切民族問題的樞紐，中國復興是亞細亞民族復興的起點。」⁴由此可見，國民政府的亞洲主義既是國家主義的，也秉持了中國是泱泱大國、中國文化是亞洲文化的中心的天朝主義心態。對於少數民族，《新亞細亞月刊》只強調開發邊疆，貫徹國民黨的民族政策。用漢族文化來同化少數民族文化才是融合民族、振興中華民族的關鍵。

自稱繼承孫中山思想的汪精衛，1940年在南京建立日軍扶持的傀儡政權後，也試圖以大亞洲主義來樹立政府的合法性，先後出版過《大亞洲主義》、《東亞聯盟月刊》及《大東亞月刊》等雜誌，以迎合日本的新東亞秩序主張，宣揚國家集團主義，認為中國要復興必須與日本合作，化敵為友，讓日本這個先進者提攜後進者，謀求東亞民族的共存共榮，但卻完全模糊了日本侵略亞洲的事實，也不提國家獨立主權的問題。汪精衛政權同時又挪用孫中山曾經以地域聯合的「門羅主義」，倡導中日聯盟，要共同把西方列強逐出亞洲的想法，強化大亞洲主義，卻罔顧日本跟西方列強一樣是侵略者的現實。

中國共產黨的亞洲概念，要追溯到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

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期的重要領袖，李大釗主張聯合弱小民族對抗強權、解放被吞併壓逼的民族、實行民族自決等的亞洲概念，⁵影響了早期的毛澤東與中共的政治取向。先讓亞洲民族各自決定國家命運，再結合成一個大聯盟，與歐美的聯邦鼎足而立，最後達至世界聯邦，建立人類的幸福——李大釗這些新亞細亞主義想法，基本上順應當時的馬克思思想與世界主義。毛澤東1920年在《大公報》議事，反對追求「大中華民國」，甚至提倡各族各地區的自決自治，當時中國有「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⁶身在湖南的他要求成立「湖南共和國」。事實上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追隨世界革命潮流，否定常被資產階級利用的狹隘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強調被壓逼階級的解放與自決。相對於侵略者的列強，中國共產黨自認為「弱小」，以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說法，中國、印度、朝鮮、安南、波斯、阿富汗、埃及、菲律賓等亞洲各國，都是國際帝國主義壓逼的弱小民族。到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才改以「中華民族」來動員民眾，但新亞細亞主義仍與中共的主導意識形態有一定的密切關聯。

1950年韓戰爆發，中共雖以保衛國家民族為由，在國內動員支持派大批自願軍往朝鮮半島「抗美援朝」，但韓戰的效果卻引發了新一波的亞洲主義。以當時中國微弱的軍力與國家整體資源的貧乏，竟然可以抵擋美國精銳部隊為首的西方聯軍，令戰爭陷入僵持狀態，這在不少亞洲以至整個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差不多等同是亞洲人種對白種人的一場勝仗，情況像1904年的日俄戰爭，⁷黃種人在列強的帝國主義時代首度擊敗白種人，振奮了世界上被列強壓逼的民族。孫中山1924年在日本宣揚王道的亞洲主義時，就引述過日俄開戰期間，他從歐洲乘船返亞洲，途經蘇彝士運河時遇上不少阿拉伯人，都歡天

喜地地慶祝日本的勝利，他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⁸但五十年代的亞洲，早已分成「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冷戰格局，韓戰的僵持狀態很難再被普遍視為是東方民族對西方民族的抗爭勝利了。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抗的冷戰二分世界，似乎已令聯合亞洲民族對抗強權的亞細亞主義，變得再無發展空間。不過，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允許下，重新開展亞洲聯繫，雖然主要是在經濟與文化的層面上，但卻是圍堵共產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戰略。冷戰形勢下，美國與蘇聯成了權力霸主，但不見得所有人都認同它們的意識形態價值。1955年，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在印尼萬隆召開了第一次亞非會議，是二十世紀首個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商討亞非事務的大型國際會議。表面上，萬隆會議只為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實際目的是要共同抵制美蘇的霸權與殖民主義舉動。中華人民共和國視此為第一次的重要亞洲外交亮相，總理周恩來避過國民黨特工的暗殺陰謀，率團抵達，卻遇上其他國家的代表質疑共產主義，批評中國對鄰國搞顛覆活動。周恩來發揮了他的外交魅力，以和解精神平息爭論，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最後會議達成共識，原則性地呈現了亞非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主權獨立、維護和平、團結合作的「萬隆精神」。這亦是「新亞細亞主義」的另一種體現形式。

雖然毛澤東其後不斷拉攏亞非拉第三世界，企圖對抗美蘇霸權，然而最終目的是豎立中國在世界舞臺的角色，是中國直接面對「世界」，而沒有把中國放在亞洲的框架來思考處理問題，更沒有意圖要真正爭取亞洲及所有被壓逼人民的解放。

現在所謂「中國崛起」的年代，亞細亞精神變得更加薄弱。周邊

的領土糾紛，令中國在其他亞洲國家眼中，漸漸成為可憎的霸主。中共政權只死抱民族主義、國家主權的意識形態，吹噓民族復興。歷史證明，國家體系主宰的亞洲理念只會被政府官方的利益挪用，唯有民間才有更大的想像空間，有進步與解放的亞細亞主義的可能。然而，目前中國的民間力量卻是比較薄弱的。

相對而言，臺灣與香港的民間社會自由度較高，自主性較大，民眾與其他亞洲地區的接觸交流亦較密切和更具彈性。那麼，臺灣與香港的「亞洲」理念可以是中國民族主義、國家主權思想與大中原天朝心態以外的另類思維嗎？篇幅關係，我在這裡只談香港的「亞洲」。

「在亞洲」的香港

“Hong Kong, Asia's world city”這句口號，算是一種怎樣的城市想像？香港的主導（官方）論述是甚麼時候才開始發現自己與亞洲的關係？這個九七回歸後由特區政府提出的定位香港的理念，究竟能引起多大的社會認同？⁹從英國殖民地時代的「中西交匯」，到廿一世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亞洲國際都會」，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想像，字面上好像多了地區成份，將「亞洲」放進了香港的視野，但似乎官方（不管是殖民地、或受國家民族主義支配的後殖民官僚）的意圖也不過是要把香港化約為一個品牌符號，藉以激起外地遊客及投資者的幻想。事實上，香港的主導論述對這個城市的想像，歷來都是以（構想）他人的目光來界定自身。這個「他者」，不難理解為「西方」或西方定立的「國際標準」；或許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不得不以這些「標準」或「目光」來審視自己。這個無法自給自足的小地方，亦只能面向外部世界，觀察他人的舉動，才可處理它本身的生存問題。在二十世

紀，香港「中西交滙」的二元想像，其實是西方霸權下「文化一元論」的演繹：「中西交滙」裡的「西」才是主角，才真正代表文明、自由、進步、現代化等價值與狀況，而「中」就只代表了傳統（如果不是落後）的東西，對外地旅客而言，提供著一定的異國情調與趣味。

然而，後殖民時代，加入了「亞洲」的香港想像，是否就是一種突破二元對立的改變呢？「亞洲」無疑是西方的發明，是西方加諸在這個地區上的概念。亞洲人要重認「亞洲」，要拒絕西方強加的價值、準則，但同時又要認同「亞洲」是自己的，這將不會是一個容易的過程。「亞洲國際都會」裡的「亞洲」，在香港主導論述的想像中，究竟有沒有包涵其他亞洲文化，對自我身份有沒有新的理解，抑或只是中/西二元對立的變奏？「亞洲」不過就是香港自己（正如中國中心論把自己等同整個亞洲或東方），而「國際」則是全球化年代下的西方的代名詞？簡言之，「亞洲」會不會只是虛擬的，它在香港的自我身份認同機制與過程中，往往無聲地消失？

不過，這樣簡單武斷地把「亞洲」當做一種噱頭、花招或宣傳技倆，未免太快扼殺了為香港創造新想像空間的可能，也太快否定了香港可以在亞細亞主義中扮演的角色。即使官方論述無心做就，但「亞洲」這個概念卻可以引來遐想，因為它不僅可能為香港這個城市製造新的未來視野，或許亦對更大的歷史、記憶產生不尋常的效應。如果把香港（重新）放置在亞洲裡，我們怎樣重述它的歷史呢？歷史敘述的改變，不是不可能衝擊國家觀念。以往談香港的「開埠」，即1842年滿清政府如何割讓這個小島予大英帝國，英國殖民統治又怎樣將這個漁村發展為一個重要的港口，扮演著中國與歐洲的轉口貿易樞紐等，調子離不開國家民族理念，即中華民族的領土如何被西方列強入侵（儘管香港的例子通常不是用來引證西方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反

而是當作「成功」的典範)，¹⁰又或者索性將香港看作一個城邦/城市國家來理解。假如，以「亞洲」的角度（我在這裡提出的「亞洲」並不具備公認的既定內涵，而可能僅僅是一個反思的媒介）去憶記香港，又可以得出一套怎樣的敘述？

日本學術知識界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來解釋十九世紀以前，西方列強勢力還未進入這個地區的亞洲秩序。香港當時是南亞藩屬國、朝貢國入貢清廷的海洋路線之一，即使香港後來受英國統治，令朝貢貿易航線需要重組，香港仍然是連接東南亞的必經據點。¹¹從日本的角度，香港早在明朝（1368–1644）的倭寇時代已與日本產生關係。「鎖國」時代的日本，很多時候是透過從香港來的商船去瞭解外部世界，到了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仍視香港為國際情報收集中心，並通過香港來分析中國，甚至曾以香港的殖民地模式來統治臺灣。1902年的「日英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Nichi-Ei Dōmei），香港其實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原因是英國以帝國利益拉攏日本的軍事力量進入亞洲區，並租借香港新界，要把香港建立為遠東的據點，藉以抗衡法國向南擴張。日本亦借與英結盟，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並讓艦隊可以定期駛入香港這個華南軍事據點，增強自己在亞洲的海洋競爭力。¹²日本與香港自十九世紀起一直有密切的商貿關係，商人、企業在港開設分店的數目也不少，十九世紀末甚至有不少日本妓女專程來港尋求較好的生活。¹³

日本與香港歷史上這種「亞洲連帶關係」，卻因1941至1945年時日本侵略並佔領香港，激起了香港華人的民族仇恨，徹底認同仇日的中國民族主義，以至日後關於香港的想像與記憶，都完全湮沒了日本（人）的積極角色（譬如日本泛亞洲主義的意識形態灌輸或大量引入華人參與戰時的管治等），而只有日本作為非常負面的侵略者的形象。

即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戰後的日本流行文化橫掃亞洲，是香港及整個華人社區年青一代的成長玩伴，「仇日」論述卻仍可以隨時在一些爭議中被召喚起來，很容易就成為了那些全無戰爭經驗的年青人民族身份認同的指標。

若果「香港：亞洲國際都會」不僅僅是一句沒有能指內涵的口號，它能否跳出被國家民族框框所局限的想像？有學者指出，亞洲的大學只有本身國族史的課程，卻甚少有關於其他亞洲國家的課程，彷彿本身的國族歷史可以完全閉門書寫，與其他亞洲鄰邦好像毫無文化交往，要等到歐洲人來到這個地區才恍然知道外面的世界。這種一面倒的民族主義模式歷史書寫方法，其實是過份地受歐洲民族主義思維的影響。¹⁴而香港作為一個「城邦」，它在國家民族主義的理念框架下是非常次等的、邊陲的；當然這個「非中心」位置，其實可能有利於它以往的文化生產與創造力發展。

自十九世紀起，通過長途的遠洋貿易，香港這個附屬於大英帝國的港口城市，與不少海洋國家聯繫起來，並見證了大量的移民從一個殖民地遷往到另一個可能同樣是由英國殖民管治的新地方。作為英帝國殖民地的香港，不但擔當了中轉站的角色，並且吸引了不少新移民到來。在這些新移民中，固然有很多是從中國內地遷入，但也有不少是來自亞洲其他地區。從1841年英國政府與商人開始管治起，經歷過日本侵佔、冷戰政治到戰後經濟起飛等一連串轉變，香港都扮演著大英帝國在遠東地帶中的一個政治和經濟前哨點，並處理著中國和南亞沿海地區的貿易。而都市裏的華裔香港人和亞裔族群，便在這複雜的殖民地歷史環境下產生了各種微妙的關係。不同的人種及其文化在港相遇，理論上應該可以發展出一個更開放、且具多元文化及都會化的海岸空間。作為一個城市/城邦，香港任何一方面的規模與格

局都是小的，為了生存，必須進入國際（因此它的「亞洲意識」也是一種「後亞洲意識」，即同時要跳出亞洲，但跟日本的「脫亞論」背景意圖完全不同）；可是，作為一個小地方，它亦經常感覺到大國的壓逼感，不得不在很多事情上跟循大國的思路，在國族框架下產生的所謂「東西交匯」概念便覆蓋了這種多元複雜性，成為描述香港故事的簡化主導結構。這種簡化的歷史描述也間接鞏固了國家論述思維。

英國殖民者為過去的香港帶來強調效率的管治以及經濟貿易發展，亦以一貫殖民統治模式主動引入其他族裔參與管治，同時也吸引了其他民族來到這裡尋找商機。譬如英國在控制印度後，便利用該地的資源與人力，進行帝國擴張（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早在鴉片戰爭[1840–1842；1856–1860]之前已觀察到，英國如何借助英屬印度的力量，在亞洲進行侵略，並慢慢逼近清治下的中國）。¹⁵比華人普遍更具英語溝通能力的印度人，成了英國在香港經商及管治社會的重要助手。因此印度人在香港百多年的歷史裡，階級背景也最複雜，從富甲一方的商賈，到專業人士、小商販，以至警察、護衛及低下層的勞動力者都有。他們有些堅持自己既有的宗教、傳統和習俗，亦有不少差不多完全遷就了香港的生活形式，說地道的廣東語言，甚至參與文化生產創作。¹⁶印度人在港的歷史甚長，關於他們的研究與訪問也有若干數量，¹⁷但卻極少有在港的印度人以自身角度撰寫的文獻流傳。¹⁸

英國殖民地自然有它的一套種族階級秩序，英國人管治下的香港，表面上並沒有太大的種族衝突問題（除了1967年中共發動的反英暴動外），一方面因為佔人口九成半以上的華裔香港人寧願生活在英國的殖民制度下，而不希望受中國的共產黨統治；¹⁹另一方面亦因為英式的種族隔離（apartheid），不同族裔社群日常生活上難有機會接

觸，卻也完全可以互相視而不見。²⁰在香港戰後的歷史裡，整個社會強調經濟發展，行政機關亦側重效率管治，一切牽涉種族複雜問題的爭議，在現代化經濟發展的大前題下，²¹都從來沒有在社會上受廣泛討論（用中國現在的流行語是「被河蟹/和諧」掉了）。一直要到臨近九七，英國即將撤離，非華裔香港居民的「國族公民」（national citizen）身份引起關注，才受到社會討論。簡言之，香港的「亞洲」身份與身世，在英國治下，基本上是沒有被提出來的。這亦反映了民族主義者（不論中西）對「亞洲」理念都不會有興趣，甚至要打壓它。

在冷戰時代（這樣說並不等於冷戰思維已成為歷史），只有「自由世界」與共產政權的對壘，「亞洲」沒有一體可言，香港的「亞洲」想像與記憶更加不可能存在。但香港的微妙複雜地位，令它不完全像日本、南韓、臺灣般是美國的保護國，用來封鎖共產主義的散播，義無反顧地站在「自由世界」那一邊。香港這個殖民地戰後可以繼續存在，必須依賴中國共產政權的非正式認可，以及中國大陸願意長期為香港提供日常所需。香港與中國的密切依存，中共對香港有經濟與戰略上的需要，²²促使香港不得不在「亞洲」（這裡的「亞洲」並不是指「亞洲四小龍」裡的亞洲，或美國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²³裡美國觀點投射的亞洲），不可能被「西方」完全收編。我在這裡不打算將香港擬人化，比喻為一個要侍奉兩股不同勢力的僕役，周旋於兩種對抗的價值體系。即使在想像上，香港也不能簡單地符號化成一個整體，但我只想描畫香港過去的兩難之境，從而構想它與「亞洲」的關係。

即使在冷戰時期，香港的日常經驗證明，純粹意識形態化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抗或中西對立，其實都並不存在。由「亞洲」角度再想像或再記憶香港，這不是個區域定位的問題，也不是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敘述歷史的問題，而是有關國族與國族之間的狹縫中存在着

的、無甚規模而又界線含糊的民間社會。大國的想像與記憶，對這些狹縫空間提不起興致，因為窄門有碍它們的宏大視野。所以有一種說法，把香港放回中國廣大的幅員與深厚的歷史裡，才有煥發想像力的契機。這可能是很對的，政治形勢下，似乎亦不可能不是這樣，但香港的複雜性卻可能需要放在「亞洲」，始見到那些在國族線上往來的界內外邊緣人。

那時候面對九七的臨界點，香港民間社會其實沒有足夠的時間，認清許多糾纏複雜的問題和處境，只是匆忙地企圖要捏塑一個雜亂的身份位置，卻又有太多的東西散失在急就章之外，不是未經整理，就是全被遺忘。當香港民間社會嘗試在有限的可能性裡，建構自己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才意識到自以為生活在文明現代社會中，這個身份卻從來都未有出現過，因為過去的管治者根本沒有意圖給予這塊殖民地任何積極有效的公民參與權利，儘管它後期的施政方法與社會氛圍確實培育了追求公民身份的意欲與實踐基礎。

像許多後殖民社會般，香港在英國殖民者撤離後，很快(主動又被動)地進入國族想像的軌跡，「公民身份」的訴求與「國民身份」的重認混合重疊，出現了以華裔巨賈商界為主導的「不完全的一族統治」，²⁴對非華裔居民以至低下階層的新移民，制度與政策上有不少排斥，讓他們沒有相同的政治權利，亦無從參與公共領域。香港這種後殖民的現狀，如果愈來愈變得「合理化」，逐漸被社會認受，正因為我們缺乏了「亞洲」的想像與記憶。

在以國族認同為標榜，實質運作是激化階級不公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裡，「公民身份」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爭取權利的觀念，而可能是一種排斥部分人的參與權，同時亦令歸屬感「去政治化」的一種手段(即只重經濟成果利益，不談民主政治參與)。當公民身份被國

家民族身份覆蓋，甚至騎劫，香港慢慢被完全納入民族的意識形態裡，但香港作為「民族」的一部份，在中國管治階層眼裡，可能跟其他五十五個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沒有太大分別；香港被賦予的所謂高度自治，與其他少數民族自治區只有程度上而沒有性質上的差別。換言之，香港本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少數民族」。²⁵或許香港的大多數要理解自己的「少數民族」位置，才較能明白及同情在港其他少數民族的困難處境。我們不容易追蹤得到，那些隱身以至消失在香港（後）殖民世界亞洲少數族裔的軌跡，也無意將那些失落了的部分還原，從而了解所謂國族歷史的原貌。因為所謂要把認識層面變為一個開放的統合模式，也不過是將有威脅性的「他者」，從排斥在外的對抗異己性，正視統合為內在自我主體的一部份。這種統合模式，骨子裡其實是勝利者、當權者的歷史敘述觀。相反，香港「亞洲」的想像與記憶目的，恰巧是要將所謂國族歷史的完整性拆解，走出國別關係的視角，不以國族利益為主導，亦不依仗西方思想理論作為普世觀點，藉以重覓那些帶來改變的時刻與可能，來釐清既有的價值系統，建立本身的認知方法。

本論文集主要的討論對象雖不是香港，但牽涉的層面與範疇卻可以對香港的問題充滿啟迪性。2011年底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的《在全球化時代再思亞洲》研討會衍生了這個論文集。

衛思韓回顧中國在歷朝統治下所奠立的遼闊疆土邊域，從而探討不同種族的互動與管治問題，呈現了界外與界內的複雜「亞洲」。**孫歌**從深刻的思想史視角，借助陶里亞蒂、丸山真男、竹內好等的想法，討論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亞洲性格與對世界的含意，尋求民主主義的真正意義，重新思考中國民主化在今天的真實道路。**Brij Tankha**以三個人物（詩人奧羅賓多、學者貝諾伊薩卡爾及政治家尼赫魯）來

探索印度對亞洲包含世界意義的想像。二次世界大戰時，印度未受過日本的侵略，反而日本曾支持印度脫離英國統治，所以印度對亞洲主義最為嚮往，即使在戰後，仍然追求突破國家主義而以人民為基礎的連結理想。

白永瑞在他的文章內釋述，韓國如何以國內民主化的進展經驗探究人文學意義上的東亞共同體，並就南北韓的對峙，提出分斷體制 (division system) 論述，即在互相敵對的同時也結下了相互依存的關係，藉以確立超越西方標準的空間，建立真正的人的社會。羅貴祥的論文聚焦分析竹內好如何理解西方不會亦沒有能力推行與實現普世性的自由與平等，而東方/亞洲的策略卻不因而摒棄西方，反而是吊詭地必須重新接受西方，從而改變西方，完成西方沒法完成的真正普世價值。酒井直樹在論文中，探討「理論」是否只是西方的特有產物，這不僅是亞洲能否出產自己理論的問題，而是即使有能力，它又能否脫離西方理論的框架。亞洲知識分子面對理論的霸權，受着西方的魔咒。他反思我們能否用「理論」顛覆東西方的身份政治。岩淵功一以竹內好的著名文章〈以亞洲為方法〉作前置，提出以「跨亞」為方法，借助東亞的電視劇、電影與流行音樂等媒體文化相互消費，讓東亞的民眾能夠相互欣賞各地經歷現代化與全球化等共通過程的異同，來建立跨國文化對話的新空間。

青柳寬與不少當代日本人對話，發現他們幻想「亞洲」是一個能夠調解日本本土保守性，又既是異國動力的中介工具。亞洲被當代日本人想像為一個保護外層，調解內在與外來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時代，日本民眾以亞洲為一面鏡子，透過它來處理從外國而來的文化，選擇符合他們生活方式的部分，加以融合。周耀輝與高偉雲以視覺和批判性為思考框架，將中國的電影與美國的流行音樂拉上關係，探求

在疾速全球化的年代，「亞洲」還可以扮演甚麼角色。Nihal Perera 以斯里蘭卡海嘯重建的個案，質疑所謂「亞洲世紀」其實仍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的規律作為中心。他研究災區重建過程中，當地災民如何回應帶著全球化邏輯的外來援助方法，以在地自身的實際需要，調協全球化並創造自我的身份，這可以理解為亞洲人如何面對源自亞洲以外的全球化策略的一個具體例子。譚迪詩嘗試以寄生者理論及菲律賓家庭傭工爭取香港居留權的事例，來查察香港人對亞洲的認知。從探討寄生邏輯裡寄主與寄客的角色不是固定不變的概念，她指出香港也可以是從鄰近亞洲國家索取廉價勞動力的寄生者。

感謝香港浸會大學的支持，以及朱耀偉、文潔華、麥勁生和鄧永成等同事的大力襄助，令研討會能順利舉行。亦感謝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中心，為部份論文譯成中文初稿，減輕了編輯修訂的工作。衷心多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林穎的支持與鼓勵、編輯楊靜的悉心工作與寶貴意見。

「亞洲」是難題、困境，但也可以是機遇與新的可能，我們希望透過本文集，為「亞洲」的種種尋找能夠思考與實踐的方向。

註釋

- 1 見Raymond Schwab, *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Europe's Rediscovery of India and the East 1680–1880*, Gene Patterson-Black and Victor Reinking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4).
- 2 見Hyun Ok Park, “Korean Manchuria: The Racial Politics of Territorial Osmosis,”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9.1 (Winter 2000): 193–217.
- 3 其實早在1912年，民國已出版了一份名為《西北》的雜誌，目的是喚起國民對蒙古及西藏等邊疆地方的政治覺醒。民國初成立，外蒙古在俄國的協助下即宣佈獨立，對民國新政府是個大打擊。《西北》雜誌雖只出版了五期，但開啟了現代中國對邊塞問題的社會關注潮。